



学科综述

2015 年国际政治经济学综述

刘玮*

【内容提要】 论文从 8 个方面梳理了 2015 年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领域的问题和动态, 包括国际秩序变革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区域经济合作、国际组织与国际制度、国际贸易、国际货币与金融、能源与气候变化以及国际发展。其中,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国际货币与金融议题是目前研究的重点和前沿问题, 在研究文献中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国际发展议题, 尤其是对外援助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兴领域,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此外, 在全球价值链迅速发展的背景冲击下, 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研究日益细化, 开始关注新的分工形式、政策工具以及贸易投资协定等治理机制。在理论方面, 传统的开放经济政治学 (Open Economy politics) 日益受到挑战, 其理性主义假设开始受到批评和反思, 应更多地采取建构主义、分布理性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关键词】 国际政治经济学 区域经济合作 国际组织 国际贸易 国际发展 国际货币与金融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 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经历了从宏观理论范式辩论向各个议题领域实证研究的转向。此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货币与金融、能源与气候变化、国际发展, 区域合作以及国际组织等议题领域。2015 年国内外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在深化既有研究领域的基础上, 取得了许多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的进展。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研究文献重点关注国际秩序变革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区域经济合作、国际组织与国际制度、国际贸易、国际货币与金融、能源与气候变化以及国际发展等八大议题。

以 2015 年国内外最主要的 13 份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刊物为对象, 本文梳理了这些刊物发表的 83 篇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文章。其中, 国际货币与金融议题的文献最多, 占到总文献的 33%。此外, 国际贸易、能源与气候变化、国际发展和国际组织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议题, 分别占 10% 左右, 其中, 国际发展成为重要的新兴研究领域。根据文献统计和后文的分析, 我们总结出 2015 年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

第一, 国际秩序变革问题重新回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传统的开放经济政治学 (Open Economy politics) 主要关注各个议题领域的对外经济政策, 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限定在各个微观问题领域。一些学者敏锐地观察到, 金融危机及大国实力变化对国际秩

* 刘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sjz-liuwei@cass.org.cn。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 并自负负责。

序带来的影响,开始从宏观层面考察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

第二,当前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建立在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理性主义与物质主义的基础上。一些研究开始对其进行批评和反思,试图从建构主义、分布理性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既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发展。

第三,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全球价值链、贸易保护与贸易争端、双边投资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等现实世界的新议程,激发了相关研究成果的产生。

第四,作为金融危机冲击效应的延续,国际货币与金融仍然是当前重要的研究领域。尤其在主权债务、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变革、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以及中央银行政策等议题涌现出大批成果。这些研究对既有的研究和政策实践规范带来巨大冲击。

第五,在国际发展领域,多边发展体系和双边援助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亮点。国内政治与国际发展援助行为之间的关系开始受到更多关注。

表 1 2015 年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文献分布 单位:篇

议题 期刊或机构	秩序变革 与 IPE 理论	区域经济 合作	国际制度	国际贸易	跨国投资	国际货币 与金融	能源与 气候变化	国际发展
《世界经济与政治》	3	3	1	1	1	2		2
《当代亚太》		3		1		2	2	
《国际政治研究》	1		1			1	5	1
《外交评论》			1	1	1	1		1
AJPS	1		1		1			
IO	1		1	1	1	2		3
RIPE			3	3	1	16	2	
ISR				1				
GG		1						
RIO			1					
NPE				1	1	2	1	
WP				1		1		
BJPS								1
合计	6	7	9	10	6	27	10	8

注:表中,AJPS 是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的缩写,IO 是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的缩写,RIO 是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的缩写,ISR 是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的缩写,GG 是 *Global Governance* 的缩写,RIO 是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的缩写,NPE 是 *New Political Economy* 的缩写,WP 是 *World Politics* 的缩写,BJPS 是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的缩写。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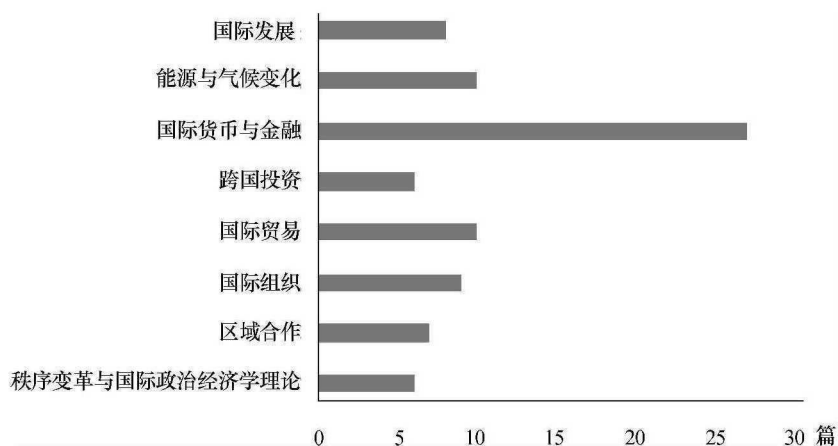


图1 2015年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文献主要领域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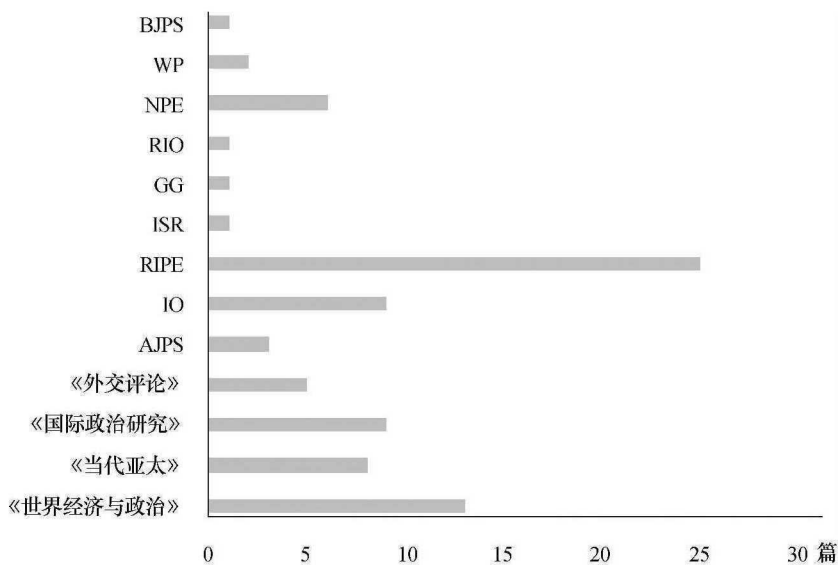


图2 2015年主要期刊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文献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一、国际秩序变革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

(一) 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变革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进入深度调整进程。国家崛起与国际秩序变革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面临的重大宏观议题。冯维江、张斌、沈仲凯（2015）在对大国崛起成败的政治经济条件进行分析时，指出如果一国能够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在发挥其禀赋的生产性比

较优势的同时对国内外不安全因素予以有效震慑和遏制,则该国能够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而不断崛起。相反,崛起中大国国内民众或利益集团以及国际盟友或伙伴国的过度期待,以及它与当前霸权国紧迫竞争导致的战略性误判会阻碍大国崛起。文章通过德国、苏联和日本等大国崛起失败的案例发现决策集中、社会动员力高、国内利益集团分化等体制性条件,更容易诱发战略性误判或误导,并造成更严重的资源错配后果,以致崛起国在内忧外患下突然溃败。而科学的试错机制、开放的经济体系、良好的国际关系和中性的权威政府,能够避免或至少减轻战略性误导或误判的不利影响。^①

此外,金融危机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该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实背景。徐秀军(2015)从实力结构、规则体系与治理理念的角度,探讨了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秩序调整问题。该文指出,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以及各自内部的经济实力出现双层分化,南北经济关系更加多元。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围绕规则制定权的博弈日益激烈,但议题主导权的分散加速了世界经济去中心化进程。自由市场经济作为现存世界的核心发展与治理理念日渐式微。但很难说一场危机就能塑造一个全新的秩序。世界经济秩序已进入一个深度调整和变化期。从现实来看,实现世界经济秩序的根本性变革仍然任重道远。^②

(二)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现实世界的变化引起了学者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反思。保建云(2015)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进行发展,提出以一定的概率分布存在的分布理性是社会行为体的真实理性。并以分布理性为条件,提出政治经济人假设及以此为基础构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新理论分析框架,弥补现有理论研究文献的某些不足。^③李滨(2015)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了系统性阐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逻辑,是以世界范围内具体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探讨各个历史阶段国际生产的不同特征,分析其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带来的影响。文章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具体展示这一研究逻辑在各个经济分支领域,如生产、交换、金融与分配领域的应用。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来演示这一逻辑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各主要分支领域,如跨国生产、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发展中的应用。^④

此外,在国际冲突研究领域,观众成本理论继续成为新的理论增长点。Levy et al.(2015)研究了观众成本理论中的承诺与一致性问题。文章将观众成本理论中领导人声明和行动的一致性机制,应用于领导人未能兑现承诺是否会导致冲突的情况。文章使用问卷试验检验公众对总统从公开威胁中退缩和为兑现承诺而卷入冲突的决策的反应。实验发现,总统

① 冯维江、张斌、沈仲凯(2015):“大国崛起失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1期,第4-35页。

② 徐秀军(2015):“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秩序:实力结构、规则体系与治理理念”,《国际政治研究》,第36卷第5期,第82-101页。

③ 保建云(2015):“分布理性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拓展”,《世界经济与政治》,第2期,第137-155页。

④ 李滨(2015):“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第7期,第5-23页。



在两种情况下都会失去支持，但是对退缩的反应更加强烈。这些不同的结果可以通过公众如何对待新的信息来解释。研究表明观众成本理论的基础是公众对一致性的关注。而且不管领导人的初始政策过程如何，公众都将对不一致进行惩罚。^① Kurizaki & Whang (2015) 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证检测在不同政体国家发生国际冲突时面临的观众成本。文章使用结构化的统计模型估计国际危机中观众成本的大小，包括已发生和未发生的成本，有效地克服了选择偏差问题。该文章发现，虽然各种政权类型的国家领导人都会面临观众成本，但是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比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面临更大的观众成本。观众成本可能高至战争优于妥协，特别是对于高度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观众成本还增加了国家在危机中的议价能力，因为当挑战带来更大的观众成本，目标国家更有可能选择接受要价。此外，文章还发现观众成本产生选择效应的证据。^②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学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开放与政治合作相互融合的重要表现。在全球治理的弱化和美国领导权衰退的情形下能否形成地区主导国领导的中心化的地区治理，成为学者们探讨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关键问题。Krickovic (2015) 的研究认为，出现一个以地区主导国（中国、俄罗斯、巴西）领导的中心化的地区治理仍旧是不可能的。虽然地区性大国在自由贸易和金融稳定上能够提供有效的领导权，但是在安全领域的领导力却很弱。地区性大国提供地区领导权的能力，被现代世界不断增长的复杂性阻碍，包括地区主义自身的冲突。未来我们将会预见到，一个存在广泛行为体和多个重叠层次复杂和动态的治理体系。^③

东盟是亚洲最有成效的区域合作实践。张蕴岭 (2015) 指出“东盟方式”中表现出的“舒适性原则”即包容性原则，是使东盟不断取得进步的秘诀。2015 年底“东盟共同体”建成之后，东盟还会继续保持和发展东盟的独特方式。东盟的意义和影响已超出其本身，对东亚地区的合作至关重要。^④ 而周玉渊 (2015) 认为，从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执行和实践效果来看，东盟在经济一体化上取得了积极进展，东盟国家对东盟经济共同体的预期收益也持乐观态度。然而，在消除非关税障碍、技术工人自由流动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自由化等核心问题上，东盟经济共同体进展依然非常缓慢，2015 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的目标将很难实现。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更多的是过程导向而非结果导向，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很大程度上只是东盟高度经济一体化的起点。^⑤ 东亚生产网络是东亚区域合作的物质基础，雷达、雷昭明 (2015) 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相关数据对金融危机对东亚生产网络的冲击进行实证考

① Levy, J. S., McKoy, M. K., Poast, P. & Wallace, G. P. R. (2015). Backing Out or Backing In? Commitment and Consistency in Audience Costs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9 (4), 988 - 1001.

② Kurizaki, S. & Whang, T. (2015). Detecting Audience Costs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9 (4), 949 - 980.

③ Krickovic, A. (2015). "All politics is regional": emerging powers and the regionaliz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Global Governance*, 21 (4), 557 - 577.

④ 张蕴岭 (2015): “如何认识和理解东盟——包容性原则与东盟成功的经验”, 《当代亚太》, 第 1 期, 第 4 - 20 页。

⑤ 周玉渊 (2015): “从东盟自由贸易区到东盟经济共同体: 东盟经济一体化再认识”, 《当代亚太》, 第 3 期, 第 92 - 112 页。

察,探讨该体系能否继续通过区域内的合作协调而保持生存和发展的潜力。^①

“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重大区域合作倡议,正在引领区域合作和跨区域合作的新实践。中国相关学者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实施和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黄河(2015)以区域性或区域间公共产品供应的理论实践解释“一带一路”战略,认为“一带一路”这个整体平台具有区域性或区域间公共产品的属性。中国通过主导“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公共产品的提供,可改善因美日欧经济停滞所导致的公共产品供应能力不足,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节点的合作网。^②

张骥、陈志敏(2015)提出,中欧“一带一路”合作,经历了从模糊处理到局部对接,再到整体、全面对接,从与部分成员国单层对接到与欧盟机构双层对接的进程,并推动中欧形成了更紧密的双边合作关系。中国需要根据欧盟对外政策的双层特性,推进对应的“一带一路”双层对接战略,并通过四个途径促进形成中欧双层对接的良性互动机制。一是横向扩散,通过与部分成员国的引领性合作示范,促使其他成员国采取政策模仿行动。二是向上投射,借助成员国塑造欧盟政策的影响力,推动欧盟与中国的积极合作对接。三是向下传导,通过在欧盟层面形成有利的政策、法律和舆论环境便利和成员国的合作。四是对外溢出,通过中欧双层对接,拓展在“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地区和全球的中欧合作。^③

林乐芬、王少楠(2015)探讨了“一带一路”建设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文章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将会促进人民币在贸易环节的使用,并且随着人民币流出,会推动人民币境外储备和境外对国内人民币投资,以及购买人民币债券回流,形成人民币国际循环流动。作者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利用系统 GMM 模型实证研究结果,提出“对外投资与贸易→经济互动效应→资本项目有序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实现路径的政策建议。^④

三、国际组织与国际制度

(一) 国际制度设计

哪些因素会影响国际制度设计是国际组织研究的重要议程。陈琪、管传靖(2015)提出,国际制度是国家之间权力和利益均衡的结果,表征的是集体行动但规避不了领导权问题。由于实力地位和利益需求的差异,国际制度设计过程中异质性参与者自然地出现策略分化,从而体现出领导、追随、搭便车、干扰等行为特征。其中,领导权的存在是国际制度设计活动启动和维持的重要条件,并在制度设计的不同环节发挥着差异化的作用,影响着制度的设计结果。^⑤ 授权和决策汇集是国际组织的两个重要制度特征,在不同的国际组织之间存在差

① 雷达、王昭明(2015):“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东亚生产网络体系”,《当代亚太》第3期,第113-129页。

② 黄河(2015):“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世界经济与政治》,第6期,第138-155页。

③ 张骥、陈志敏(2015):“‘一带一路’倡议的中欧对接:双层欧盟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1期,第36-52页。

④ 林乐芬、王少楠(2015):“‘一带一路’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1期,第72-90页。

⑤ 陈琪、管传靖:“国际制度设计的领导权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第8期,第4-155页。



异。Hooghe & Marks (2015) 讨论了国际组织中的授权与决策汇集的决定因素。他们认为, 授权和汇集受两个基本设计特征的限制, 即国际组织的政策组合的范围和其成员的规模。文章使用一个新的横截面数据集, 提供有关国际组织决策的详细和可靠的信息进行检验。结果发现, 大型会员组织倾向于拥有更多的授权和汇集。国际组织的政策范围越广, 其成员越愿意授权, 但他们不太愿意汇集权威。^①

规范或理念也是影响国际制度设计的重要因素。Chwieroth (2015) 研究了规范导向如何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他指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员在设计基金组织借贷条件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但既有文献对他们动机的认识非常有限。该文展示了基金组织借贷条件的设计, 如何与职员的规范导向及其共同的专业培训相联系。来自类似培训的专业联系, 有助于将工作人员围绕一组共同的规范方向束缚在一起, 从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目标提供信息。当借款国官员不同意这些方向时, 职员有动力收紧条件。这种行为也符合职员对时间不一致和道德风险的关注。该文使用基于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和借款国官员之间存在的专业关系的数据集, 为这一论点找到了强有力的统计支持。然而, 当国家官员与基金组织职员持有共同的规范导向时, 贷款的条件性并没有更加宽松。职员对时间不一致的偏好和道德风险的担忧可能会反对更宽松的处置。可见职员的规范依从性在基金组织贷款条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二) 国内政治与多边主义

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国内政治与国际协议中的违约行为的关联性。Pelc & Urpelainen (2015) 解释了国际协议在何时允许国家通过支付违约金的形式来补偿违约行为。文章发现在不同的国际协议里, 对于通过提供补偿受影响的各方来允许“有效违约”的容忍程度是不同的。为了说明这种变化, 该文考虑协议的设计影响了国内集团的政治动员的可能性。文章认为, 当违约的好处主要归于政府自身时, “有效违约”更容易遭到国内利益集团的反对。当政府仅间接受益提供政治支持的利益集团是违约补偿的直接受益者时, “有效违约”更容易获得国内支持。文章的模型预测, 国际贸易协定应该遏制“有效违约”, 而投资协议应该支持“有效违约”。之后, 文章通过考察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中的争端解决和执行机制来检验这些影响。^③

国家的政体类型也是影响其参与多边主义进程的重要因素。Carter & Stone (2015) 研究了联合国大会上的民主与多边主义问题。该研究发现, 民主国家比非民主国家更加支持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中的重要投票立场。这是因为民主国家持有共同的理念, 还是强制的体现? 从1985年开始, 美国法律规定美国国务院决定重要的投票, 并且援助支出与投票决策挂钩。为了解析各种替代性解释的影响, 文章引入了战略性统计模型、估计投票偏好、脆弱性的影响力、议题联系的可信性等不可直接观察的具有理论价值的解释。研究结果否定了共同民主价

① Hooghe, L. & Marks, G. (2015). Delegation and pooling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0 (3), 305 - 328.

② Chwieroth, J. M. (2015). Professional ties that bind: how normative orientations shape IMF conditional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4), 757 - 787.

③ Pelc, K. J. & Urpelainen, J. (2015). When d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greements allow countries to pay to breach?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0 (2), 231 - 264.

值的假说。贫穷的民主国家比独裁国家表现出更加反对美国立场的投票偏好，他们比独裁国家更愿意采取可能减少对外援助的象征性立场。当日仅当美国的援助更受民主国家依赖时，民主国家才会支持美国的立场。文章将样本分为冷战和冷战后阶段，发现冷战的结束改变了美国处理盟国和左右翼政府的联系战略方式，但民主的影响仍然不变。^①

（三）国际组织间关系与全球治理改革

随着国际组织在各个议题领域的扩散，国际组织间关系成为重要的研究议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盟（EU）的关系，为研究国际组织间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Hodson（2015）试图解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与欧盟发展的关系变化。在金融危机之前，基金组织和欧盟双方在平行轨道上运行，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动荡期间也没有相互调整的空间。在危机之后，由于欧洲领导人向基金组织和欧洲委员会授予监督权，基金组织成为欧盟的一个事实上的机构。文章通过经典委托—代理—监管视角基础上的多重监管方法，探讨了这种双重授权的原因和后果。^②

同时，新兴国际组织可以为崛起国提供全球治理改革博弈的外部选项。Lipsy（2015）从政策领域、外部选择权等角度，提出一个解释国际关系中国际制度变革的理论框架。该文章试图回答什么因素会决定国际制度分配性的变革？为什么有的国际制度能够顺应成员国的能力和利益，进行成员国决策权和影响力的调整，而有的却非常困难？该文提出国际制度分配性的变革受到政策领域特征的影响。一些政策领域倾向于产生单一集中的国际制度，面临的竞争压力较小，从而限制了成员国的外部选择权和推动分配性变革的努力。而在另一些政策领域国际制度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因此也会更加迅速地反映成员国利益和权力的变化。文章通过比较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具有共同的成员国身份和内部规则，但处于不同的政策领域的国际组织改革。从而检验了政策领域特征对国际制度分配性变革的影响。^③

新兴国家积极通过建立新兴多边机制，推动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Hopewell（2014）分析了巴西、印度和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崛起，并认为新兴力量崛起的驱动力比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要更加复杂和充满异质性。新兴力量采取了截然不同的通往权力的道路。中国的崛起与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联系得比较紧密，而巴西和印度的权力主要源自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动员和领导能力，使得其影响力超越了经济实力。一个重要的结果是，巴西和印度被认为在WTO谈判中比中国采取了更积极和进取的态度，在塑造多哈回合议程中发挥了比中国更重要的作用^④。

金砖国家机制是新兴国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载体。任琳、尹继武（2015）探

① Carter, D. B. & Stone, R. W. (2015). Democracy and Multilateralism: The Case of Vote Buying in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9 (1), 1-33.

② Hodson, D. (2015). The IMF as a de facto institution of the EU: A multiple supervisor approach.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3), 570-598.

③ Lipsy, P. Y. (2015).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Policy Areas, Outside Options, and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9 (2), 341-356.

④ Hopewell, K. (2014). Different paths to power: The Rise of Brazil, India and China a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2), 1-28.



讨了金砖国家合作的起源。作者指出,金砖国家是中国提倡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话语权和规范制定权的重要平台。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外生功能因素,包括系统外部环境、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和国际制度环境。外生规范因素有重复合作的报偿文化、完善公正国际规范的意愿。内生功能因素为行为体数目、互补性和国内政治。内生规范因素则是同质性的认知和内生共识。金砖国家对保持报偿结构的判断和对未来影响的认知,是将上述影响变量联系起来的两组机制。金砖国家的合作起源于其政治经济崛起的背景和国际制度的非中性。金砖国家间政治和经济相互依存逐渐增长,国际地位和利益追求的共识超越了国家间同质性差异,进而产生联盟组织的信任,推动金砖国家组织的制度化和机制化发展。^①

高尚涛(2015)从实践理论与实践模式视角,分析了中国参与金砖国家机制的进程。该文认为,中国特色的实践理论把西方的“实践转向”与中国的实践学说结合起来,以实践逻辑为中介,建立起“参与实践”与“身份承认”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理论框架可以用于中国参与金砖国家机制的实践活动的分析。中国在国际环境和国内外资源条件的推动下,发起了以话语实践、创新实践和联盟实践为主的创建金砖国家机制的实践活动。凝聚了创建金砖国家机制和中国作为平等成员国参与合作并开展集体行动的共识,这一共识经过金砖国家机制加以确认,赋予了中国参与国际交往的全新集体身份——拥有平等权利和对等义务的金砖国家机制创始成员国,并且随着金砖国家机制的发展,这一身份不断充实和深化。中国利用这一新的集体身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新作用,对国际体系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②

四、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

(一) 区域贸易协定与国际贸易规则变革

国际贸易秩序变革及中国的应对,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议题。张亚斌、范子杰(2015)对国际贸易格局分化,带来的国际贸易秩序演变进行研究。该研究指出,随着国际贸易格局不断分化,各个经济体着眼于自身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优势与劣势,力求将自身利益诉求植入国际贸易秩序中,多重博弈将成为一种常态。中国应尽力维护这一多边规则,同时要积极推进双边与区域贸易规则的制定。特别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促进贸易便利化为突破口,强化自身在双边与区域贸易秩序建设中的主导权。^③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投资协定(TTIP)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巨型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兴起,正在重塑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巨型贸易协定谈判的政治过程及其影响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Solís & Katada(2015)从自由贸易协定的竞争性扩散视角,考察了日本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对亚太区域一体化的影响。作者在考虑经济、司法和政治等多个层面竞争性压力,以及关键国家作为FTA扩散触发器的能力等

① 任琳、尹继武(2015):“金砖国家合作的起源:一种理论解释”,《国际政治研究》,第36卷第5期,第102-128、7-8页。

② 高尚涛(2015):“实践理论与实践模式:中国参与金砖国家机制进程分析”,《外交评论》,第32卷第1期,第55-68页。

③ 张亚斌、范子杰(2015):“国际贸易格局分化与国际贸易秩序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第3期,第30-46页。

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 FTA 扩散的分析框架。文章提出,关键国家的作用受能力和可信性两方面因素影响。TPP 提高了日本的可信性,使得长期停滞不前的 FTA 谈判可能加速。其对某些国家带来了经济、司法和政治上的外部性,包括中日韩 FTA、RCEP 和日欧贸易谈判的相关国家。^①

Cintia (2014) 以拉丁美洲优惠贸易协定在 2000 年之后的扩散为例,考察了贸易协定的竞争性扩散机制。文章认为,优惠贸易协定的扩散和遭到的抵抗,导致了两个替代性的贸易一体化模式。一方面,中美洲和环太平洋拉美地区的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的南—北优惠贸易协定。另一方面,是由巴西和南方共同市场国家主导的后自由主义地区主义,并作为抵制美国主导的优惠贸易协定和新自由主义政策防火墙。此文解释了美国主导的优惠贸易协定会在该地区产生竞争性扩散的动力,同时也激发了南方共同体市场对美国优惠贸易协定竞争性扩散的抵制,最终导致了拉丁美洲两种不同模式的一体化模式。^②

李巍、张玉环(2015)对美国自贸区战略的逻辑提出一种现实制度主义的解释。该文提出,作为一种国际制度的 FTA,既是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区域性公共产品又能被主导国“私有化”为权力工具,以追求自身的私人目标。以 FTA 为核心的国际制度竞争,正在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③孔繁森、李巍(2015)进一步对美国建立在自由贸易区战略基础上的区域制度霸权进行研究,提出力量结构调整、单向支付与软实力建设三项任务完成情况,是大国主导自贸区与区域制度霸权战略能否达成的决定性因素。文章通过对 NAFTA、FTAA 与 TPP 三个案例的分析发现,美国追求地区霸权的战略尝试之所以成效各异,原因就在于其对三项任务的完成情况不同,进而影响到其地区影响力以及相较于对手的地区竞争力。^④

此外,竺彩华(2015)重点关注了全球巨型 FTA 的谈判进程。其研究指出,当前世界经济体系演变呈现出三大特征。一是世界经济重心不断向发展中经济体转移,“欧美世纪”正在向“亚洲世纪”转型。二是美国的唯一“中心”地位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三是“中心—外围”式的利益格局正在向“网络板块”格局转型。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体系中也出现了三大巨型 FTA 谈判,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投资协定(TTIP)。从世界经济体系演变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今天的超大型 FTA 现象,TPP 和 TTIP 是发达国家再平衡“亚洲世纪”的两大平台,而 RCEP 则是亚洲平衡 TPP 和 TTIP 的核心载体。在这一平衡与被平衡的博弈进程中,中美互动成为关键性因素。^⑤

① Solís, M. & Katada, S. N. (2015). Unlikely pivotal states in competitive free trade agreement diffusion: The effect of Japan's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Participation on Asia-Pacific regional integration. *New Political Economy*, 20 (2), 155 - 177.

② Cintia, Q. (2014). Competitive diffusion of trade agreements in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6 (2), 240 - 251.

③ 李巍、张玉环(2015):“美国自贸区战略的逻辑——一种现实制度主义的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8期,第127-154页。

④ 孔繁颖、李巍(2015):“美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与区域制度霸权”,《当代亚太》,第2期,第82-110页。

⑤ 竺彩华(2015):“世界经济体系演进与巨型 FTA 谈判”,《外交评论》,第32卷第3期,第46-71页。



（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动因及影响

金融危机过后，随着各种形式的贸易主义兴起，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动因及影响成为关注点。Curran（2015）通过对2012—2013年欧盟对中国太阳能板行业的反倾销调查为案例，考察了公共机构和全球生产网络的互动。一方面，公司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位置，比其国别更能清晰地界定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全球生产网络是可塑的，可以通过调整结构适应新的贸易限制。作者发现在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市场日益成为中国参与国际谈判的重要杠杆。在贸易领域，中国作为消费市场的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权力关系。^①

农业部门的贸易保护主义一直是全球自由贸易的绊脚石。Thies（2015）通过对经合组织国家支持农业生产者的政治决定因素的分析，探讨了农业和工业保护主义政策的相似性。虽然大多数定性研究认为，农业保护主义是例外或至少在某些方面是与其他行业不同的。但该研究发现了农业保护主义与工业保护主义的相似性的证据。该文纳入产业保护主义文献中的政治—制度变量，并通过几个横断面时间序列分析，验证了对农业生产者支持的政治符合其他行业领域的保护主义一般模式的假说。^②

Jensen et al.（2015）考察了货币低估与反倾销案件的关系。文章运用“新新”贸易理论，解释了在持续的外币低估和进口竞争加剧的时代，为什么美国企业反倾销申诉反而在下降。文章发现，货币低估对反倾销案件的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FDI）企业的行业内部和跨行业都表现出异质性。在国外进行垂直性投资或资源获取型投资的公司，不太可能提交反倾销申请。公司可能在货币低估的背景下进行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因此，美国公司增加垂直性对外直接投资，降低了贸易争端的可能性。随着时间地推移，持续性货币低估会伴随着美国跨国公司在货币低估国家的垂直型直接投资和内部贸易的增加。在较大的美国跨国公司中，反倾销申诉的可能性与企业内贸易的增加呈负相关。虽然货币低估与反倾销案件的增加相关联。但是，同货币被低估国家进行的企业内进口降低了反倾销申诉的可能性。该研究强调了国际贸易和投资中，企业异质性对于理解国际经济政策的政治动员的核心作用。^③

（三）全球价值链、移民与贸易治理

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重新塑造了国际贸易条件，使得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国际贸易的治理问题。Peters（2015）对贸易与移民政策的关联性进行考察，发现贸易和移民政策不能作为单独的政策研究，必须进行整体研究。贸易和移民政策是相互替代的，贸易政策通过对企业的影响，会影响劳动力稀缺国家的移民政策。贸易封闭增加了企业对移民的平均需求导致移民开放。而自由贸易降低了企业层面对移民的平均需求，导致移民受到

① Curran, L. (2015). The impact of trade policy o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the solar panel cas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5), 1-30.

② Thies, C. G. (2015). The declining exceptionalism of agriculture: identifying the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of agricultural trade protection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2), 339-359.

③ Jensen, J. B., Quinn, D. P. & Weymouth, S. (2015). The Influence of Firm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Foreign Currency Undervaluations on US Trade Dispu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9 (4), 913-947.

限制。为了检验这一论点，文章开发了一个从 18 世纪后期—21 世纪初，19 个国家的移民政策的新数据库。数据显示，贸易政策确实对移民有影响，即在不考察贸易政策的情况下，无法对移民政策进行全面理解。因此该文建议，贸易和移民政策以及其他对外经济政策应该共同研究。^①

Dallas (2015) 从全球价值链、企业和碎片化生产时代的贸易异质性等视角，对贸易治理进行了探讨。该文利用独特的贸易交易数据（包括标准国家间贸易统计数据的企业层面的原始贸易交易数据，涉及电子和轻工业中的 18 个分部门中的 439 个中国最大出口商），检验贸易是否按照全球价值链（GVC）文献中的理论所认为的那样，以异质化的方式进行治理。该文为全球价值链（GVC）对贸易的治理，提供了实质性的经验支持，并且推进了全球价值链（GVC）和以企业为中心的贸易理论。^②

五、跨国投资的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关系、制度与跨国直接投资

跨国投资一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政治关系和制度特征是研究者解释跨国直接投资的重要维度。Thies (2015) 从母国和东道国与第三方国家保持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的角度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文章关注投资者对其母国对贸易伙伴施加的经济制裁的回应，如何影响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文章发现，制裁国的公司为了应对本国政府对贸易伙伴采取的强制性措施，会将投资转移至可以间接从受制裁经济体获益的国家，以获得替代性收益。那些所谓的制裁行为的“潜在破坏者”（受制裁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且具有破坏制裁国的历史），将会从其他国家的不幸中获益。文章结合使用美国经济制裁数据和美国从 1966 至 2000 年间，对外直接投资全球流量数据对假说进行检验，发现投资决策对政治因素的反应，部分超越了母国—东道国两分法的解释。^③

制度是影响跨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Caner (2015) 的论文构建了一个国家中心的讨价还价模型，探讨国内制度对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文章发现，行政能力和制度能力构成的国家能力对跨国投资区位选择决策具有重要影响。文章选取现代汽车集团 2005 年计划 15 亿美元在土耳其建汽车制造厂的案例。展示了国家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府能力是如何影响投资准入结果的。国家越弱，跨国公司决定不投资的可能性大。^④

双边投资协定作为国际层面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对跨国投资发挥着重要影响。一些学者开始探讨影响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及其结果的因素。例如陈兆源、田野、韩冬临 (2015) 探讨了

① Peters, M. E. (2015). Open Trade, Closed Borders: Immigr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World Politics*, 67 (1), 114–154.

② Dallas, M. P. (2015). ‘Governed’ trade: global value chains, firms,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trade in an era of fragmented produc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5), 875–909.

③ Barry, C. M. & Kleinberg, K. B. (2015). Profiting from Sanctions: Economic Coercion and U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ird-Party 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9 (4), 881–912.

④ Bakir, C. (2015). Bargaining with Multinationals: Why State Capacity Matters. *New Political Economy*, 20 (5), 63–84.



什么因素会影响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形式选择。文章发现中国作为东道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母国的授权压力。作为母国,中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愈发注重保护海外投资利益。但并未运用自己的经济权力来使得他国接受更多国际授权的争端解决机制。文章以1982—2013年中国签订过的134份双边投资协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文章的假说。^① Campello & Lemos (2015)以巴西为案例,探讨了双边投资协定未批准现象的原因。他们解释了巴西在90年代签订的14个双边投资协定,但是没有一个通过这一独特经验。文章发现,国会集中且强大的意识形态反对确实阻碍了双边投资协定的通过。但是无决断力的行政机构,总是通过替代性渠道满足投资者需求,才是解释双边投资协定未通过的重要原因。^②

(二) 政治腐败与跨国直接投资监管

跨国直接投资与腐败往往相伴随。腐败与跨国直接投资的关系一直是跨国投资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Malesky et al. (2015)重新考察了外资与腐败的关系。虽然主流研究认为,外资通过降低垄断租金或者扩散公司治理的最佳实践来降低腐败。该文章同时发现,对外投资降低腐败的因果机制并不明晰。文章认为,外国公司行贿主要是为了进入受保护的行业以获得租金,因此行贿倾向会随着部门的预期利润而变化。文章利用越南三波全国范围的调查中对2000份外资和国内商业的问卷,检验不同经济部门的期望利润率对跨国公司行贿倾向的影响。发现经济开放对行贿倾向的影响取决于投资限制政策。^③母国对跨国直接投资的监管,成为新兴对外投资国面临的重要问题。

唐晓阳(2015)以中国对非投资为例,探讨了中国海外投资与投资监管问题。该文指出,随着中国企业逐渐走出国门和对外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企业合法、可持续经营的操作和监管方面都暴露出一些问题。中资企业在非洲经营过程中产生了环境保护、劳工保护、社会融合等比较典型的问题。而且,当前中资企业在海外经营的法律意识仍然淡薄,既有的海外投资监管机制约束力不足,尤其缺乏对中小私营企业的监督能力。文章进而简要比较了欧美国家对海外投资的监管机制,发现这些国家总体上对防治贿赂和腐败有着较为严格的举措。而对于环境保护和社会融合等事务,则更多由各企业自身依据经济效益最优原则去掌控尺度。最后,文章就改善对驻非中资企业的监管提出了几点建议,认为可以从防控贿赂腐败、增强企业与媒体和公众交流、完善企业信息登记和联系沟通机制,以及增加驻外法律人才培训和输送等方面入手,促进海外中资企业的合法、可持续经营。^④

① 陈兆源、田野、韩冬临(2015):“双边投资协定中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基于1982—2013年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定量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第3期,第122—148页。

② Campello, D. & Lemos, L. (2015). The non-ratification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in Brazil: a story of conflict in a land of cooper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5), 1055—1086.

③ Malesky, E. J., Gueorguiev, D. D. & Jensen, N. M. (2015). Monopoly Money: Foreign Investment and Bribery in Vietnam, a Survey Experi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9 (2), 419—439.

④ 唐晓阳(2015):“中国海外投资与投资监管:以中国对非投资为例”,《外交评论》,第32卷第3期,第26—45页。

六、国际货币与金融的政治经济学

(一) 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

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关注的核心议程。高海红(2015)指出汇率制度选择、储备货币和流动性,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等理论讨论和政策变化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制度转变过程中的重要遗产。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面临着经济格局与金融权力之间形成的明显错配、国际金融体系不稳定和持续性全球失衡等突出问题。实现储备货币多元化,重组和增设多层级的国际金融机构,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网,是未来国际金融体系重建的核心内容。^① 谢晓光、周帅(2015)构建了一个国际货币权力的结构—进程分析框架,旨在揭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中,国家间货币关系演变的一般性规律。该研究还深入探讨了东亚地区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货币关系的演变,并对中国如何将国家政治和经济实力转换成货币权力进行了分析。^②

作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变革的重要推动力,人民币国际化受到学者的持续关注。李巍(2015)探讨了货币伙伴外交与人民币崛起的战略支点国。他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不是一个纯粹的单边政策行为,需要得到其他国家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因此,人民币崛起为国际货币,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同时也是一个外交事件。自2009年掀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大幕以来,中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国内政策调整,释放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力量。另一方面也通过积极的货币外交争取更多的货币合作伙伴,以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政治基础。中国与货币伙伴的合作包括进行货币互换、推动本币结算、促进货币直接交易、建立货币清算机制等多项内容。国内政策调整与国际货币外交共同构成了驱动中国货币崛起的双轮。目前中国已经初步搭建起一个包括47个国家在内的多层次货币合作伙伴网络。而其中五个国家因其自身能力和意愿,都能对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提供重要而关键的支持作用,需要中国将其作为人民币崛起进程中的战略支点国予以特殊对待。^③

此外,新兴经济体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金融外交行为,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Armijo & Katada(2015)超越传统研究,将金融外交界定为强国对弱国的金融制裁,对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外交进行理解和理论化。作者提出,金融外交的目标既可能是防御性的也可能是进攻性的,可以是以双边为目的也可以是体系层面的。金融外交既可以采取金融性又可以采取货币性的政策工具。随着新兴国家的国家间实力分配的增加,也将会将金融外交战略从狭窄防御性和双边层面向进攻性的以全球或体系层面的目标转变。^④ 熊谦、田野(2015)对美国等发达

① 高海红(2015):“布雷顿森林遗产与国际金融体系重建”,《世界经济与政治》,第3期,第4-29页。

② 谢晓光、周帅(2015):“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东亚货币关系的演变:国际货币权力结构—进程视角”,《当代亚太》,第1期,第131-155页。

③ 李巍(2015):“货币伙伴外交与人民币崛起的战略支点国”,《外交评论》,第32卷第1期,第27-54页。

④ Armijo, L. E. & Katada, S. N. (2015). Theorizing the financial statecraft of emerging powers. *New Political Economy*, 20 (1), 42-62.



国家的金融制裁行为进行研究,试图回答为何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对伊朗实施金融制裁长达10年之后才实现政治上的突破。研究发现,国际合作的法律化是提高金融制裁的有效性的关键。由于单边金融制裁容易被目标国规避,为了达到提高金融制裁效果的目标,制裁发起国会努力提高国际合作的法律化程度,以扩大制裁联盟的范围,提高联盟的紧密度。^①

(二) 主权债务危机的政治经济学

2015年《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政治经济学”为主题,出版了一期特刊,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进行了深刻分析与反思。该特刊的目的在于考察政治经济学对主权债务危机分析的贡献,并将其与比较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欧洲经济治理的次级学科的长期辩论联系起来。在导论中,首先从审查国家金融系统的比较政治经济学文献开始以解释危机的演变。然后考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金融(主权债务)市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它们在分析主权债务危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最后导论概述了在欧洲经济治理中对“不对称”的长期学术辩论,并对欧盟各国政府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主要政策和体制改革进行了批判性回顾。^②

Quaglia & Royo (2015) 解释了为什么西班牙经历了充分的主权债务危机,最后不得不为其银行诉诸欧元区财政援助,而意大利则没有。通过结构性比较,他们将主权债务危机解析为银行危机和国际收支危机。作者认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银行商业模式和国家银行体系的独特特征,用于解释每个国家危机的不同情景非常有帮助。这种“以银行为基础”的分析,有助于对银行业变化的相关研究做出贡献,以便解释首先爆发的全球银行危机和随后爆发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不同影响。^③ 杨攻研、刘洪钟(2015)对典型发达国家1880—2009年间,政府债务百年史中成功的债务削减周期进行实证分析。文章发现,支出紧缩型的财政巩固政策、长期经济增长以及通货膨胀与利率政策相配,有利于政府实现成功的债务削减。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因素对于政府债务削减的影响存在着巨大差异。此外,民主化程度、国内政治竞争性,以及不同的法律起源,也会影响到债务化解的成功与否。^④

此外,Soudis (2015)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探讨评级机构对国家政策的影响。该文检验了主权债券评级可能引发新自由主义标准趋同的主张,发现评级机构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作用被夸大了。评级公司对国内经济改革没有直接的因果效应。该文采用覆盖绝大多数评级国家的样本发现,没有出现与新自由主义标准相符的放松管制及相关改革的强劲趋势。评级较低的国家或那些经常降级的国家,在政策改革模式上与高评级国家没有什么显著差异。这一结果适用于诸如信贷、劳动和商业管理、通货膨胀水平、财产权的法律结构和保障,以及公共部门的

① 熊谦、田野(2015):“国际合作的法律化与金融制裁的有效性:解释伊朗核问题的演变”,《当代亚太》,第1期,第98-130页。

② Howarth, D. & Quaglia, L. (201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uro area's sovereign debt crisis: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f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3), 457-484.

③ Quaglia, L. & Royo, S. (2015). Bank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in Italy and Spa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3), 485-507.

④ 杨攻研、刘洪钟(2015):“政府债务削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期,第127-154页。

规模等政策领域。文章的结论是,信用评级机构作为国内改革的潜在促进者的作用有限。^①

(三) 国际金融监管与跨境资本管制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国际金融监管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兴领域。Goldbach (2015) 对全球银行业监管标准制定过程中的不对称影响和监管俘获进行了实证研究。文章通过对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员会框架中的 9 个不同的国家、跨国和国际行为体,进行定量和定性的评估。发现全球金融监管标准制定的核心动力,是政客和银行组成的国家联盟,及跨国公司与监管者组成的跨国协调联盟共同作用力。^②

Reisenbichler 解释了何种条件会决定国家在国家中心和技术主义的国际监管网络设计之间的选择。在论文中,作者通过搜集相关档案和对决策者进行访谈,追踪国家偏好和谈判能力的变化,发现国家在对金融稳定论坛进行设计时,存在对两种模式的博弈。一种是,美国支持的以各国财长为主的国家中心主义监管网络模式。另一种是,德国支持的以已有国际机构为主的技术主义监管网络模式。最后的博弈结果是美国支持的,可以运用美国议价权力的以国家为中心的金融稳定论坛。因此,国家金融监管结构和国家在金融领域的权力地位,会影响国际金融监管网络的变化。^③

Tsingou 从俱乐部治理视角解释了跨国金融政策共同体,如何通过俱乐部模式的组织影响金融治理的规则内容。作者对作为跨国政策共同体的 G30,如何在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影响和协调跨国金融监管政策,使其符合私人部门的偏好进行了细致论述,提供了理解国际金融监管的俱乐部治理视角。^④

金融危机刺激了跨境资本流动政策规范的变革。学术界开始反思既有的跨境资本流动政策,由此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Gabel & Gallagher (2015)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 年第 1 期,以“资本控制和全球金融危机”为主题组织专刊,对为什么不同国家对跨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和流出带来的宏观经济挑战,做出了不同的反应进行探讨。^⑤几十年来,IMF 一直是经济正统的代名词。其中包括,不赞成对跨境资本流动采取政策限制。但是在 2012 年,它宣布了一个新的“机构观点”,给予资本流动管理更大的空间,并实际上限制资本所有者的权利。IMF 在 2008 年 10 月爆发灾难后,救助冰岛计划为这一政策转变铺平了道路。这是 IMF 第一次为发达国家的资本管制背书。Sigurgeirsdóttir & Wade (2015) 描述了冰岛的繁荣和萧条,以及政府和基金组织如何设法应对危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下,政府实施资

① Soudis, D. (2015). Credit Rating Agencies and the IPE: Not as influential as though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4), 813 - 837.

② Goldbach, R. (2015). Asymmetric influence in global banking regulation: transnational harmonization, the competition state, and the roots of regulatory fail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6), 1087 - 1127.

③ Reisenbichler, A. (2015). The domestic sources and power dynamics of regulatory networks: evidence from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5), 996 - 1024.

④ Tsingou, E. (2015). Club governance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financial rul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2), 225 - 256.

⑤ Gabel, I. & Gallagher, K. P. (2015). Capital controls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 introduc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1), 1 - 6.



本流出管制,最初作为紧急反应,然后作为长期稳定措施。资本控制机制发生在一个复杂的博弈“游戏”里。专业导向的采取资本账户自由化战略的中央银行与试图转向其具有优势的资本控制的政党之间,发生了所谓的“冰岛的战役”。他们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临时”资本管制在五年多以后仍然存在,并从冰岛的案例中得出了一些广泛的经验教训,以理解金融繁荣和可能到来的萧条。^①

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重新塑造资本管制将金融领域的政策空间扩大到比亚洲危机更大,更一致的程度。如何解释这一非凡的观念和政策演变? Grabel (2015) 的论文强调了有助于资本管制不断演变的如下五个因素。1. 日益自主的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主要是由于它们对亚洲危机的成功反应。2. 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坚定,部分原因是它们在应对当前危机方面取得了相对成功。3. 货币基金组织对改变的全球经济进行务实调整,其影响的地域受到严重限制,并且在资金上对之前客户的需求增大。4. 极端情况下,国家对资本管制的需要。例如,经济面临崩溃的国家,以及更重要的是那些表现“太好”的国家。5. 经济学家和基金组织职员思想的演变。该文还探讨了,资本管制重塑的紧张关系,例如通过行为守则“驯化”使用资本管制的努力。^②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大多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激增,加剧了这些国家的金融脆弱性。与20世纪90年代和2008年导致全球金融危机前五年类似的激增不同,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重新调整了跨境资本流动政策。根据文献,“资本流动假说”的普遍性,使得全球金融市场的结构性权力,对于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的国家来说非常强大。这使得重新调整跨境资本流动被认为是相当困难的。该文描述了巴西和韩国如何能够抵消全球资本市场的结构性权力,并在危机之后如何制定跨境金融法规。

Gallagher (2015) 根据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偏离“资本流动假说”,提出“对抗货币权力”的概念。^③ Chwioroth (2015) 从国际金融政策潮流的管理和转变的视角,考察了新兴市场面临国际金融共同体资本流入控制的政策潮流。如何采取应对措施,作者对巴西和韩国在应对2009年的资本突然流入时,采取的不同资本控制政策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两国采取了不同的战略来管理国际资本管理规范的变化。巴西认识到资本流入控制潮流,但是挑战其合法性。巴西认为其采取的措施,是对高企的宏观经济风险的适当应对,并且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在推动不受欢迎的资本流入其经济体。相反,韩国虽然采取了资本控制措施,但对资本流入控制的潮流的合法性表示了更大程度的接受。^④

(四) 中央银行政策的政治逻辑

Moschella (2014) 从中央银行的政策视角考察了发达世界的货币战争。文章对瑞士在全球

① Sigurgeirsdóttir, S. & Wade, R. H. (2015). From control by capital to control of capital: Iceland's boom and bust, and the IMF's unorthodox rescue packa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1), 103-133.

② Grabel, I. (2015). The rebranding of capital controls in an era of productive incoheren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1), 7-43.

③ Gallagher, K. P. (2015). Countervailing monetary power: Re-regulating capital flows in Brazil and South Kore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1), 77-102.

④ Chwioroth, J. M. (2015). Managing and transforming policy stigma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emerging markets and controlling capital inflows after the cris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22), 44-76.

金融危机早期对大量资本流入的反应进行研究,探讨了瑞士国家银行干预外汇市场,并引入汇率区间以及赌上高代价的反通胀声誉阻止瑞士法郎的升值的原因。作者认为,中央银行共同体货币范式的变化是瑞士干预外汇市场行为的原因。新兴的货币范式通过促使瑞士国家银行对金融稳定风险更加敏感和提供管理这些风险的宏观审视政策空间来影响其政策决定。^①

Bodea & Hicks (2015) 考察了价格稳定与中央银行独立性,并分析了纪律、可信性与民主制度的关联。他们的研究论文指出,尽管存在不同的实证证据,在过去 20 年,在中央银行独立性确保价格稳定的假说之下,央行独立性获得普遍性提高。结合理论视角和法律上的央行独立性的新年度数据(78 个国家,1973—2008 年),该文重新审视了央行独立性与物价稳定的关系,并区分货币政策纪律(印更少的钱)和货币政策的可信性(公众对中央银行可能行为的看法)的作用。^②

Poast (2015) 考察了战时中央银行的作用。其研究论文指出,战争是昂贵的必须装备部队和购买武器。当战争的巨额借款使得主权信用变得困难时,中央银行提高了政府的借款能力。作为政府债务的直接购买者,中央银行增加了其对政府的边际贷款人违约行为,施加惩罚的有效性。这增加了贷款人对政府在违约情况下将受到惩罚的信心,使得贷款人愿意以较低的利率购买债务。鉴于中央银行能够提供低借贷成本,主权国家有动机保留中央银行。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的数据表明,拥有一个中央银行降低了主权国家的借款成本,特别是在战争时期。^③

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学界对美联储尤为关注。Golub & Reay (2015) 对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美联储的政策及其决策过程进行了考察。他们提出,美联储负责监督、分析和最终稳定美国金融市场。它拥有无与伦比的获取经济数据途径、与金融机构的高级别联系,以及拥有大量经过专业培训的经济学家。但为何美联储对被广泛认为导致了 2008 年金融危机的金融发展并不关心?在他们的论文中,他们使用来自危机前的大量美联储文件,特别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会议记录。发现联邦政策制定者和工作人员,了解金融市场的相关发展,但并不非常注重这些发展,而且不认为会导致重大的系统性风险。在汲取经济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该文提出,在危机的前几年,美联储的认知范式集中在“事后干预”,即美联储在出现系统性不稳定之后,才能采取措施限制市场的辐射效应。此外,该文认为,制度惯例在维持这种模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促使美联储在危机前对警告信号的关注不够。^④

刘玮、邱晨曦(2015)从霸权利益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形式的转换视角,探讨了美联储货币互换协定兴起的政治逻辑。论文指出,霸权国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并主要通过授权国际组织和签订双边协议网络两种方式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形式的转变是霸权国调整国际体系公共利益和霸权利益之间关系的结果。当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条件恶化时,霸权国通过缔结双边协议网络,临时替代基于委托—代理的国际组织,收缩国际公共产品的惠及范围,增加国际公共产品的排他性来捍卫霸权利益。在 60 年代的国际收支危机

① Moschella, M. (2014). Currency wars in the advanced world: resisting appreciation at a time of change in central banking monetary consensu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22 (22), 134 - 161 (28).

② Bodea, c. & Hicks, R. (2015). Price Stability and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Discipline, Credibility, an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9 (1), 35 - 61.

③ Poast, P. (2015). Central Banks at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9 (1), 63 - 95.

④ Golub, S., Kaya, A. & Reay, M. (2015). What were they thinking? The Federal Reserve in the run-up to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4), 657 - 692.



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美联储通过货币互换协定网络,替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救助机制,成为危机中的国际最后贷款安排。通过国际最后贷款供给形式的转换,美联储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救助美国金融利益和战略价值覆盖的国家。^①

(五) 政体与金融发展

政体与金融发展的关系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Carney (2015) 探讨了金融全球化对国家政治体制的影响。在其撰写的论文中,提出金融全球化从两个方面威胁到政体的稳定性。第一,金融全球化通过增加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可能引发政治更替。第二,放松外国金融资本或敌对政治团体的金融资本的市场进入。作者提出,一党制国家往往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尤其表现为国有上市公司的形式,来化解面临的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威胁。而且,一党制国家比其他政体有更大的动机和能力来化解金融全球化的威胁。文章通过对7个东亚经济体,1996年的607家公司和2008年的856家公司的数据,及马来西亚和韩国的案例,对文中的假说进行了验证。^②反过来,民主是否促进金融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已有研究多认为民主能够促进金融发展,但是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却是混杂的。

Menaldo & Yoo (2015) 考察了民主、精英偏见与拉丁美洲的金融发展关系。他认为只有吸引中间投票者的民主国家应该经历金融发展。因为这些民主国家在过渡后,采用了自己的宪法,而不是继承了之前的独裁政体。作者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拉丁美洲,从经验上验证了这一理论。在拉美许多国家的政体类型发生了循环变化,金融结果出现了几次逆转和改善。文章在不同层面中,找到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了文中的观点。虽然大众民主普遍倾向于改革金融体系、更多地参与银行体系、增加信贷供应和降低价格,并扩大股票市场,但具有精英偏见的民主国家却不是这样。^③

政府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命题。Lai (2014) 探讨了产业政策与伊斯兰金融的发展,并将产业政策研究从实体经济扩展到金融服务业部门。他通过对马来西亚的伊斯兰金融发展的研究,分析政府的政策是如何发展独立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部门来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马来西亚伊斯兰金融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发展是政府对金融部门采取产业政策的结果。^④

此外,Johnson & Barnes (2015) 以匈牙利为案例,探讨了金融民族主义及其国际推动因素。匈牙利的维克托·奥尔宾和其中右翼的青民盟党,在2010年4月的议会选举中,赢得了压倒性胜利。一个经济自我管理的民族—民粹主义平台运行。在其论文中,作者探讨了匈牙利的金融民族主义转向,及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改变进程的压力所做的惊人的成功抵抗。文章将金融民族主义理论化,然后在匈牙利追溯其观念根基和当代特征。他们认为,两个国际因素讽刺地使奥尔班将他的金融民族主义思想从理论推向实践。一是国际货币基金

① 刘玮、邱晨曦 (2015):“霸权利益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形式的转换——美联储货币互换协定兴起的政治逻辑”,《国际政治研究》,第36卷第3期,第78-96页。

② Carney, R. W. (2015). The stabilizing state: State capitalism as a response to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in one-party regim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4), 838-873.

③ Menaldo, V. & Yoo, D. (2015). Democracy, Elite Bias,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World Politics*, 67 (4), 726-759.

④ Lai, J. (2014). Industrial policy and islamic finance. *New Political Economy*, 20 (2), 1-21.

组织和欧盟的政策，首先促成了青民盟党的选举胜利，然后使其很难限制奥尔班的权力。二是国际债券市场的宽容行为，特别是奥尔班的意愿和能力，使用非正统的金融民族主义政策来控制政府赤字和债务。这减少了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匈牙利的杠杆，并鼓励债券市场忽视产生这些数字的令人讨厌的政治。^①

同时，也有一些研究开始探讨中国的金融发展政策。当人们在全球金融危机时，对凯恩斯主义产生新的兴趣。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反应是有效的凯恩斯反周期战略，甚至是无危机发展战略的典范，也出现了一些对中国的凯恩斯主义措施的批评声音。Jiang (2015) 试图探寻，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对凯恩斯主义的反应程度如何，什么因素决定了凯恩斯政策在设计和实施中的中国特征？文章指出，中国在危机应对中，遵循了凯恩斯式的方法，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GDP 增长并创造了就业。然而，中国的凯恩斯主义是一个被庸俗化的版本，是与发展型国家合并之后的结果，其宣扬大国家、巨额赤字支出，以及没有真正让消费者或私营部门受益的社会化投资。该文还分析了中国的理念和制度政治，如何削弱了凯恩斯主义，加剧了社会经济问题。理念政治包括在危机开始时，凯恩斯话语的主导地位以及对短期结果的痴迷。制度因素包括“烟花”式地方政府政治，国家被国有企业俘获，以及没有适当地对执行进行监督的集中的中央分配性权力。^②

七、能源与气候变化的政治经济学

(一) 国际能源合作

多边能源机构是推动国际能源合作和能源政策协调的重要力量。Wilson (2014) 探讨了多边组织和国际能源合作之间的关系，以及多边能源机构的发展动力。作者认为，能源的政治经济特征，即安全化及其带来的经济民族主义，能够解释为什么多边能源机构数目不断激增，却仍无法实现有效的能源合作。十个全球层面的多边能源机构都面临成员国、设计和承诺的问题。能源的安全化导致政府更倾向于低成本的软法，而不是去达成更加有效的硬法性质的制度设计。能源的安全化限制了多边能源合作的发展，意味着目前加强多边合作机制的努力很难成功。^③ Meckling et al. (2015) 从国家资本主义视角，解释了中国和印度国家石油公司国际化的国内根源。与国家引导和市场主导的国际化模式不同，作者提出，国家石油公司“走出去”反映了一种混合的政府—公司的竞合模式。例如，国家石油公司不断强化的企业性质、利润导向、母国政府的部分支持与干预主义之间的冲突与合作。作者认为，虽然中国和印度在政治体制上迥然不同，但国企治理的事实上程序规则和行政能力，比法律上规定

① Johnson, J. & Barnes, R. (2015). Financial nationalism and its international enablers: The Hungarian experien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3), 535 - 569.

② Jiang, Y. (2015). Vulgarisation of Keynesianism in China's response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2), 360 - 390.

③ Wilson, J. D. (2014). Multilateral organisations and the limits to international energy cooperation. *New Political Economy*, 20 (1), 85 - 106.



的正式的政治制度,更能影响国家与公司的互动模式。^①王铁军(2015)对中俄双边能源合作进行研究,指出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的体系认知和政府权力是解释俄罗斯对华能源合作的两个中介变量。该研究通过梳理1991年至今,尤其是2008年以来中俄合作的历程发现,当俄罗斯对其国际地位满意时,不论政府权力是否充沛,其对华能源合作意愿都不强烈,而当其对国际地位不满且政府权力不足时,即使有着强烈的对华能源合作意愿,实际结果也会非常有限。而如果此时政府权力充沛则会大大提升对华油气合作的愿望。^②

(二) 全球气候治理

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博弈过程。Bagozzi(2015)注意到气候变化谈判的多面特性。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主要发生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年会期间,目前几乎涉及到世界每一个国家。这样一个庞大而异质的国家集团,对气候变化谈判的复杂性有什么影响?一个更小、更同质性的国家分类会产生更有效的谈判空间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作者将潜在狄氏配置分配,应用于涵盖了第16—第19届缔约方大会上,国家代表的正式发言的高层气候变化会议演讲的语料库。文章对话料库主题的分析表明,气候变化谈判的主要方面,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对合作的关切。尽管缩小至较小的核心国家集团谈判,可能会减少这种差距。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无监督主题模型可以大大扩展,我们对气候变化谈判和国际合作的理解。^③

全球气候变化规范会对不同国家带来分配效应。Ciplet(2015)对国际气候变化政治的不平等性和一致性进行反思。该文分析了当代国际气候变化条约是如何在低收入国家之间生成的。这些条约大大削弱了气候变化行动的法律框架,可能对最贫穷国家造成不平等的影响。这一案例表明,国际合作理论没有充分解释,低收入国家同意多边协议的过程。作者发展并应用了新葛兰西协商同意框架,揭示了促使低收入国家表态同意的三个机制,物质让步、规范趋同和结构调节。这种方法将国际合作视为由强国和弱国与非国家行为体协调,共同组成战略权力关系的过程。因此,有助于弥合合作理论中普遍存在的行为体—结构鸿沟,并揭示国际治理中不平等的持久性。^④

Hochstetler & Milkoreit(2015)讨论了气候变化谈判中新兴国家的责任问题。该研究指出,包括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基础四国”,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气候治理突出了负担分摊安排,尽管收益一般是不可分割的公共物品,但要求各国可能采取代价高昂的行动来解决全球性问题。该文分析了基础四国的联合声明,及其对多边气候谈判的个人和集体意见。以确定他们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自身在全球气候治理面前,应该承担的责任分担的理性主义和原则性论点。文章认为,基础四国对自身作用的

① Meckling, J., Kong, B. & Madan, T. (2015). Oil and state capitalism: government-firm cooperation in china and indi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6), 1-29.

② 王铁军(2015):“体系认知、政府权力与中俄能源合作——来自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当代亚太》,第2期,第111-129页。

③ Bagozzi, B. E. (2015). The multifaceted nature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0 (4), 439-464.

④ Ciplet, D. (2015). Rethinking Cooperation: Inequality and Consent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Politics. *Global Governance*, 21 (2), 247-274.

期望非常不清楚，国家行动比国际承诺更大。^①

在区域气候变化治理方面，于宏源（2015）考察了气候变化与北极地区地缘政治经济变迁。他认为，随着气候变暖、北极海冰融化加速，北极区域的安全风险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气候变化对于北极的影响远不限于生态环境本身，也对资源竞争和地缘政治等提出了新的挑战，并对国际安全产生深层次影响。在生态环境方面，气候变化对北极生态系统造成负面影响，进而冲击全球生态系统稳定。在资源安全方面，气候变化引发了北极资源开发热潮，在资源可持续发展、原住民保护和规则建设方面产生矛盾和竞争。在地缘政治方面，气候变化引发北冰洋海域的争夺和跨界冲突等，将会改变北极地缘政治现状。气候变化不断推动北极生态系统和政治经济地缘关系处于变化之中，相关域内和域外国家仍将围绕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和地缘利益等进行合作与竞争。^②

曹德军（2015）对欧盟气候公共产品供给，进行了跨层次分析。他指出，气候变化治理是一种典型的“存量外部性”全球公共产品，多元主体往往引发“集体行动的困境”。欧盟公共产品的供给逻辑超越了传统的主权国家模式，呈现出复杂的“多层治理”特性。它是超国家、国家与次国家三层治理的有机整合，一度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者。正是超国家、国家与次国家的三层镶嵌，欧盟气候治理网络才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社会资本就是凝聚各方合力的关键变量。根据制度型社会资本与关系型社会资本的组合格差，可以揭示出欧盟跨层治理的运作机理。欧盟气候治理的成功源于社会资本的跨层次整合，欧盟与成员国之间构成“制度强连带”。欧盟与次国家行为体之间构成“关系强连带”。以及欧洲国家与次国家之间则构成“双重强约束”。^③

李慧明（2015）提出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已经成为影响全球气候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该研究认为在碎片化时代，鉴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全球公地和全球公共产品的特性，其更多地需要方向型、理念型和手段型国际领导，即一种基于多边主义理念下的国际气候制度而形成的绿色国际合作领导。当前，中美欧的三边互动表明，以联合国气候制度为核心的绿色国际合作领导体制正在显现。同时，中国一定能为全球绿色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并成为绿色国际合作领导的关键一方。^④

王志芳（2015）探讨了中国建设“一带一路”面临的气候安全风险。他指出气候变化可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实施产生重大影响。作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点区域，如东南亚、南亚及中亚等地区存在着一系列气候安全风险，如由于气候变化所导致的贫困加剧、移民增加、社会动荡、跨界资源冲突、恐怖主义蔓延等。为保证该战略倡议的顺利实施，中国应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一是利用现有环境与气候合作机制，协助提升沿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二是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批准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原则。三是发挥融资机制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提高各方应对气候变化的自觉性。四是针对

① Hochstetler, K. & Milkoreit, M. (2015). Responsibilities in Transition: Emerging Powers in the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21 (2), 205 - 226.

② 于宏源（2015）：“气候变化与北极地区地缘政治经济变迁”，《国际政治研究》，第36卷第4期，第73-87、6-7页。

③ 曹德军（2015）：“嵌入式治理：欧盟气候公共产品供给的跨层次分析”，《国际政治研究》，第36卷第3期，第62-77、6页。

④ 李慧明（2015）：“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时代的国际领导及中国的战略选择”，《当代亚太》，第4期，第128-156页。



沿线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状况，制定灵活的战略实施方案。^①

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了气候变化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张海滨（2015）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讨论了气候变化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他认为，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事件增加，如冰川融化、海洋酸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进而对中国的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和政治安全产生了诸多的负面影响。海平面上升使中国的部分陆地，面临被淹没的现实威胁。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威胁中国军队人员、装备和设施安全，制约部队战斗力的形成和提高。气候变化危及中国的水资源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以及中国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与合法性等等。

气候变化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是广泛的，未来的影响将继续增大。因此，中国不仅应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还应该将其置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框架下统筹规划。在现有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机制体制基础上，中国应牢固树立气候变化事关中国国家安全的观念，从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看待应对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强军民间协作，形成军民一体的应对气候变化格局。高度重视中国军队新军事变革中的绿色低碳因素，着力打造一支绿色低碳军队。加快气候变化立法进程，尽快出台应对气候变化法。^②

李志斐（2015）研究了气候变化对中国周边地区水资源安全的影响。她提出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周边地区水资源安全的重要因素。气候变化将加剧中国周边地区的水资源短缺性危机，加速青藏高原冰川融化，引发大规模的水环境移民，由此推动水资源问题实现“安全化”。同时将导致跨国界河流的径流量的年际和季节性变化增大，加剧国家之间的水资源分配和供应的不稳定性，进而诱发种族冲突和引发地区动荡。其次，“中国水威胁论”会被推波助澜，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误导周边国家民众非客观地认知中国。对此，中国应充分发挥负责任地区大国的作用，以积极姿态携手周边国家，在气候合作框架下制定相应的对策。加强对周边国家的资金支持与援助力度，帮助它们提升水资源管理和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共同推动水资源安全的实现。^③

八、国际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一）多边发展援助体系

冷战后的多边发展体系经历了兴衰起伏。孙伊然（2015）从隐含的利益交换角度，探讨了国际发展兴衰的逻辑。该研究认为，国际发展进程始于霸权对欠发达国家的相关承诺及实践。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今，国际发展的兴衰起伏表明，霸权对国际发展的冷淡可谓一种常态，相形之下，二战期间国际发展的启动与兴起才是特例。战后，霸权对国际发展进程的支持，出现由盛而衰的重大转折，体现在贸易、援助、金融等多个议题领域。事实上，霸权对国际

① 王志芳（2015）：“中国建设‘一带一路’面临的气候安全风险”，《国际政治研究》，第36卷第4期，第56-72、6页。

② 张海滨（2015）：“气候变化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国际政治研究》，第36卷第4期，第11-36、5页。

③ 李志斐（2015）：“气候变化与中国周边地区水资源安全”，《国际政治研究》，第36卷第4期，第37-55、5-6页。

发展的任何付出,必以相应回报为前提。霸权投身于国际发展进程的内在逻辑与深层理念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根据欠发达国家的利益多寡或价值高低来决定其支持力度。“利益交换”的逻辑,主导着国际发展进程的基本走向。霸权受利益驱使而支持国际发展,又在其认为利益有限甚至冲突的情形下削弱或放弃支持,此即战后国际发展进程长期陷入低谷的主因。不过,“霸权主导型”国际发展范式的衰微并不意味着国际发展本身再难有作为。世界政治经济中的某些迹象表明,国际发展得以重振的契机或许正在孕育成型。^①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国际发展议题的新进展。黄梅波(2015)探讨了“后2015发展议程”及中国的应对。她指出,千年发展目标将于2015年到期。世界各国政府、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以联合国为代表的诸多国际组织,均对“后2015发展议程”展开激烈讨论。讨论焦点集中在核心目标设定和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构建两方面。一方面,后2015发展目标的设定,不可能完全脱离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必须是在考虑千年发展目标及其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兼顾各地区、各国的发展现实,进而形成综合性的指标框架。另一方面,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是“后2015发展议程”推进和实现的重要支撑。这要求从新千年以来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进展中汲取经验,加强合作,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中国应当更加有效地参与到“后2015发展议程”的讨论和制定过程中。充分利用“后2015全球发展目标”制定和全球伙伴关系建立的契机,积极主动把握全球发展的主导权。^②

此外,多边援助机构是国际发展融资的重要主体。为什么有的多边援助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大国实现其利益的工具?而另一些机构则保持了较高的相对自主性,对庞殉、何榘焜(2015)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选取美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四个地区援助机构。考察并解释了美国对这些地区开发银行操控程度的差异及其原因。并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制度理论和政治联盟理论,提出影响操控程度差异的四个解释因素,即地区开发机构所属地缘区域和业务范围与美国利益的攸关性、美国是否主导机构创立、机构的决策权力分散程度和行政官僚机构复杂程度,以及美国在机构中是否有足够多的可靠盟友来建立获胜联盟。^③

多边援助行为的国内政治根源成为新的研究方向。McLean(2015)探讨了国内经济利益对多边援助的影响。文章指出,已有关于对外援助的研究认为援助国国内的经济团体,例如出口商应该反对多边援助。因为多边援助并不能够使得援助国严格进行援助绑定,或者促进国内经济利益。但是经济团体确实能够从一些类型的多边援助中受益。这成为援助国政府通过支持国际组织获益的动机。文章通过“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和全球环境基金的援助分配数据,以及按商品划分的国际贸易数据来检验提出的观点。文章发现强有力的经验支持了,当捐助者的国内经济集团可能从国际环境组织的计划创造的机会中获益时,捐助国政府会增加对这些组织的援助分配的观点。^④

① 孙伊然(2015):“隐含的利益交换:国际发展兴衰的逻辑”,《外交评论》,第32卷第3期,第72-103页。

② 黄梅波(2015):“‘后2015发展议程’与中国的应对”,《国际政治研究》,第36卷第1期,第91-112页。

③ 庞殉、何榘焜(2015):“霸权与制度:美国如何操控地区开发银行”,《世界经济与政治》,第9期,第4-30页。

④ McLean, E. V. (2015). Multilateral Aid and Domestic Economic Interes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9 (1), 97-130.



（二）双边发展援助

双边援助的国内政治经济动因，一直是对外援助的重要研究议题。Bermeo & Leblang (2015) 探讨了移民与对外援助之间的关联。他们指出，当讨论移民与对外发展援助的全球分配之间的联系时，居住在援助国的受援国的移民人口规模是决定援助承诺的一个重要因素。两个互补性的假说证明了这种关系。首先，援助国利用外国援助实现更广泛的移民目标。通过推动移民来源地区的发展，降低向援助国移民的需求。其次，已经在援助国生活的移民，动员和游说该国向其家乡提供更多的对外援助。通过收集 1993—2008 年期间，22 个援助国和 150 多个受援国组成的大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其结论强烈支持了以上结论。^①

此外，Steinwand (2015) 探讨了援助碎片化问题。指出援助国的扩散和援助碎片化是困扰对外援助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既有研究认为，援助碎片化对援助效率具有消极影响，而且会破坏接受国的制度。增加援助协调被认为是处理这一问题的重要方法。但是既有实证研究发现，援助国在援助协调方面的进展非常有限。该文从区分对外援助中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特性出发，分析了援助国协调行动时的动机和面临的集体行动问题。文章引入了援助国领导权的概念，用以说明接受国和对外援助领导国之间建立的排他性的长期绑定关系，发现援助领导权在长期内会衰落。文章通过合并空间自回归 (SAR) 模型、非参数模型鉴别技术，以及援助渠道数据对理论进行了检验。发现援助领导权的存在，能够帮助其他援助国协调行为，从而降低援助的碎片化。援助领导权之下的援助是一种私人物品的逻辑，是降低竞争和碎片化的有效方式。^②

对外援助对受援国国内政体的影响，一直受到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的关注。Glasgow & Golder (2015) 从对外援助视角，探讨了为什么民主化带来增长，而成为民主国家后却没有带来增长这一问题。在民主经济学的研究中有一个未解决的难题，为什么一个国家在民主化的进程中会带来经济增长，而成为了民主国家之后却不再伴随经济增长？文章表明，大量和立即涌入的外国援助进入新的民主国家，解释了民主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因此没有民主或民主化的国内政权特征似乎带来了增长。援助在解释民主化—增长关系中的重要性，表明民主化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不能单单从内部因素进行充分理解。^③

作为新兴援助国的代表，中国的对外援助行为正在成为新的学术热点问题。白云真 (2015) 对“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外援助转型进行研究。提出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框架与战略规划，需要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增长、政治、社会与道德四大目标。提出制定中国对外援助战略规划、确定中长期的沿线国家国别援助行动计划、开展援助政策及其项目评估、推进公私伙伴关系、提出“共同发展伙伴关系”倡议、深化三方发展合作，以全球视

① Bermeo, S. B. & Leblang, D. (2015). Migration and Foreign Ai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9 (3), 627 - 657.

② Steinwand, M. C. (2015). Compete or Coordinate? Aid Fragmentation and Lead Donorship.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9 (2), 443 - 472.

③ Glasgow, G. & Golder, S. N. (2015). Foreign Aided: Why Democratization Brings Growth When Democracy Does No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5 (1), 53 - 71.

野、世界眼光来提高援助项目的有效性与质量等，创新对外援助模式的路径。^①

英文参考文献

1. Armijo, L. E. & Katada, S. N. (2015). Theorizing the financial statecraft of emerging powers. *New Political Economy*, 20 (1), 42 – 62.
2. Bagozzi, B. E. (2015). The multifaceted nature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0 (4), 439 – 464.
3. Bakir, C. (2015). Bargaining with Multinationals: Why State Capacity Matters. *New Political Economy*, 20 (5), 63 – 84.
4. Barry, C. M. & Kleinberg, K. B. (2015). Profiting from Sanctions: Economic Coercion and U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ird-Party 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9 (4), 881 – 912.
5. Bermeo, S. B. & Leblang, D. (2015). Migration and Foreign Ai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9 (3), 627 – 657.
6. Bodea, c. & Hicks, R. (2015). Price Stability and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Discipline, Credibility, an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9 (1), 35 – 61.
7. Campello, D. & Lemos, L. (2015). The non-ratification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in Brazil: a story of conflict in a land of cooper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5), 1055 – 1086.
8. Carney, R. W. (2015). The stabilizing state: State capitalism as a response to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in one-party regim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4), 838 – 873.
9. Carter, D. B. & Stone, R. W. (2015). Democracy and Multilateralism: The Case of Vote Buying in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9 (1): 1 – 33.
10. Chwieroth, J. M. (2015). Managing and transforming policy stigma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emerging markets and controlling capital inflows after the cris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22), 44 – 76.
11. Chwieroth, J. M. (2015). Professional ties that bind: how normative orientations shape IMF conditional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4), 757 – 787.
12. Cintia, Q. (2014). Competitive diffusion of trade agreements in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6 (2), 240 – 251.
13. Cipler, D. (2015). Rethinking Cooperation: Inequality and Consent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Politics. *Global Governance*, 21 (2), 247 – 274.
14. Curran, L. (2015). The impact of trade policy o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the solar panel cas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5), 1 – 30.
15. Dallas, M. P. (2015). ‘Governed’ trade: global value chains, firms,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trade in an era of fragmented produc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5), 875 – 909.
16. Gallagher, K. P. (2015). Countervailing monetary power: Re-regulating capital flows in Brazil and South Kore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1), 77 – 102.
17. Glasgow, G. & Golder, S. N. (2015). Foreign Aided: Why Democratization Brings Growth When Democracy Does No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5 (1), 53 – 71.
18. Goldbach, R. (2015). Asymmetric influence in global banking regulation: transnational harmonization, the competition state, and the roots of regulatory fail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6), 1087 – 1127.
19. Golub, S., Kaya, A. & Reay, M. (2015). What were they thinking? The Federal Reserve in the run-up to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4), 657 – 692.

^① 白云真 (2015):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外援助转型”,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11期, 第53 – 71页。



20. Gabel, I. & Gallagher, K. P. (2015). Capital controls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 introduc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1), 1 – 6.
21. Gabel, I. (2015). The rebranding of capital controls in an era of productive incoheren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1), 7 – 43.
22. Hochstetler, K. & Milkoreit, M. (2015). Responsibilities in Transition: Emerging Powers in the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21 (2), 205 – 226.
23. Hodson, D. (2015). The IMF as a de facto institution of the EU: A multiple supervisor approach.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3), 570 – 598.
24. Hooghe, L. & Marks, G. (2015). Delegation and pooling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0 (3), 305 – 328.
25. Hopewell, K. (2014). Different paths to power: the rise of Brazil, India and China a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2), 1 – 28.
26. Howarth, D. & Quaglia, L. (201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uro area's sovereign debt crisis: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f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3), 457 – 484.
27. Jensen, J. B., Quinn, D. P. & Weymouth, S. (2015). The Influence of Firm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Foreign Currency Undervaluations on US Trade Dispu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9 (4), 913 – 947.
28. Jiang, Y. (2015). Vulgarisation of Keynesianism in China's response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2), 360 – 390.
29. Johnson, J. & Barnes, R. (2015). Financial nationalism and its international enablers: The Hungarian experien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3), 535 – 569.
30. Krickovic, A. (2015). "All politics is regional": emerging powers and the regionaliz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Global Governance*, 21 (4), 557 – 577.
31. Kurizaki, S. & Whang, T. (2015). Detecting Audience Costs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9 (4), 949 – 980.
32. Lai, J. (2014). Industrial policy and Islamic finance. *New Political Economy*, 20 (2), 1 – 21.
33. Levy, J. S., McKoy, M. K., Poast, P. & Wallace, G. P. R. (2015). Backing Out or Backing In? Commitment and Consistency in Audience Costs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9 (4), 988 – 1001.
34. Lipsy, P. Y. (2015).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Policy Areas, Outside Options, and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9 (2), 341 – 356.
35. Malesky, E. J., Gueorguiev, D. D. & Jensen, N. M. (2015). Monopoly Money: Foreign Investment and Bribery in Vietnam, a Survey Experi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9 (2), 419 – 439.
36. McLean, E. V. (2015). Multilateral Aid and Domestic Economic Interes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9 (1), 97 – 130.
37. Meckling, J., Kong, B. & Madan, T. (2015). Oil and state capitalism: government-firm cooperation in China and Indi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6), 1 – 29.
38. Menaldo, V. & Yoo, D. (2015). Democracy, Elite Bias,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World Politics*, 67 (4), 726 – 759.
39. Moschella, M. (2014). Currency wars in the advanced world: resisting appreciation at a time of change in central banking monetary consensu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22 (22), 134 – 161 (28).
40. Pelc, K. J. & Urpelainen, J. (2015). When d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greements allow countries to pay to breach?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0 (2), 231 – 264.
41. Peters, M. E. (2015). Open Trade, Closed Borders: Immigr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World Politics*, 67 (1), 114 – 154.
42. Poast, P. (2015). Central Banks at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9 (1), 63 – 95.

43. Quaglia, L. & Royo, S. (2015). Bank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in Italy and Spa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3), 485 – 507.
44. Reisenbichler, A. (2015). The domestic sources and power dynamics of regulatory networks: evidence from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5), 996 – 1024.
45. Sigurgeirsdóttir, S. & Wade, R. H. (2015). From control by capital to control of capital: Iceland's boom and bust, and the IMF's unorthodox rescue packa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1), 103 – 133.
46. Solís, M. & Katada, S. N. (2015). Unlikely pivotal states in competitive free trade agreement diffusion: The effect of Japan's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Participation on Asia-Pacific regional integration. *New Political Economy*, 20 (2), 155 – 177. *Economy*, 20 (2), 155 – 177.
47. Soudis, D. (2015). Credit Rating Agencies and the IPE: Not as influential as though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4), 813 – 837.
48. Steinwand, M. C. (2015). Compete or Coordinate? Aid Fragmentation and Lead Donorship.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9 (2), 443 – 472.
49. Thies, C. G. (2015). The declining exceptionalism of agriculture: identifying the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of agricultural trade protection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2), 339 – 359.
50. Tsingou, E. (2015). Club governance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financial rul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 (2), 225 – 256.
51. Wilson, J. D. (2014).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limits to international energy cooperation. *New Political Economy*, 20 (1), 85 – 106.

中文参考文献

- 白云真 (2015):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外援助转型”,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 11 期, 第 53 – 71 页。
- 保建云 (2015): “分布理性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拓展”,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 2 期, 第 137 – 155 页。
- 曹德军 (2015): “嵌入式治理: 欧盟气候公共产品供给的跨层次分析”, 《国际政治研究》, 第 36 卷第 3 期, 第 62 – 77、6 页。
- 陈琪、管传靖: “国际制度设计的领导权分析”,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 8 期, 第 4 – 155 页。
- 陈兆源、田野、韩冬临 (2015) “双边投资协定中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基于 1982 – 2013 年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定量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 3 期, 第 122 – 148 页。
- 冯维江、张斌、沈仲凯 (2015): “大国崛起失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 11 期, 第 4 – 35 页。
- 高海红 (2015): “布雷顿森林遗产与国际金融体系重建”,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 3 期, 第 4 – 29 页。
- 黄河 (2015): “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 6 期, 第 138 – 155 页。
- 黄梅波 (2015): “‘后 2015 发展议程’与中国的应对”, 《国际政治研究》, 第 36 卷第 1 期, 第 91 – 112 页。
- 孔繁颖、李巍 (2015): “美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与区域制度霸权”, 《当代亚太》, 第 2 期, 第 82 – 110 页。
- 雷达、王昭明 (2015): “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东亚生产网络体系”, 《当代亚太》第 3 期, 第 113 – 129 页。
- 李滨 (2015):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逻辑”,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 7 期, 第 5 – 23 页。
- 李慧明 (2015): “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时代的国际领导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代亚太》, 第 4 期, 第 128 – 156 页。
- 李巍 (2015): “货币伙伴外交与人民币崛起的战略支点国”, 《外交评论》, 第 32 卷第 1 期, 第 27 – 54 页。



15. 李巍、张玉环 (2015): “美国自贸区战略的逻辑——一种现实制度主义的解释”,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8期, 第127-154页。
16. 李志斐 (2015): “气候变化与中国周边地区水资源安全”, 《国际政治研究》, 第36卷第4期, 第37-55、5-6页。
17. 林乐芬、王少楠 (2015): “‘一带一路’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11期, 第72-90页。
18. 刘玮、邱晨曦 (2015): “霸权利益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形式的转换——美联储货币互换协定兴起的政治逻辑”, 《国际政治研究》, 第36卷第3期, 第78-96页。
19. 庞殉、何榘焜 (2015): “霸权与制度: 美国如何操控地区开发银行”,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9期, 第4-30页。
20. 任琳、尹继武 (2015): “金砖国家合作的起源: 一种理论解释”, 《国际政治研究》, 第36卷第5期, 第102-128、7-8页。
21. 孙伊然 (2015): “隐含的利益交换: 国际发展兴衰的逻辑”, 《外交评论》, 第32卷第3期, 第72-103页。
22. 唐晓阳 (2015): “中国海外投资与投资监管: 以中国对非投资为例”, 《外交评论》, 第32卷第3期, 第26-45页。
23. 王铁军 (2015): “体系认知、政府权力与中俄能源合作——来自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 《当代亚太》, 第2期, 第111-129页。
24. 王志芳 (2015): “中国建设‘一带一路’面临的气候安全风险”, 《国际政治研究》, 第36卷第4期, 第56-72、6页。
25. 谢晓光、周帅 (2015):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东亚货币关系的演变: 国际货币权力结构-进程视角”, 《当代亚太》, 第1期, 第131-155页。
26. 熊谦、田野 (2015): “国际合作的法律化与金融制裁的有效性: 解释伊朗核问题的演变”, 《当代亚太》, 第1期, 第98-130页。
27. 徐秀军 (2015): “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秩序: 实力结构、规则体系与治理理念”, 《国际政治研究》, 第36卷第5期, 第82-101页。
28. 杨攻研、刘洪钟 (2015): “政府债务削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1期, 第127-154页。
29. 于宏源 (2015): “气候变化与北极地区地缘政治经济变迁”, 《国际政治研究》, 第36卷第4期, 第73-87、6-7页。
30. 张海滨 (2015): “气候变化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 《国际政治研究》, 第36卷第4期, 第11-36、5页。
31. 张骥、陈志敏 (2015): “‘一带一路’倡议的中欧对接: 双层欧盟的视角”,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11期, 第36-52页。
32. 张亚斌、范子杰 (2015): “国际贸易格局分化与国际贸易秩序演变”,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3期, 第30-46页。
33. 张蕴岭 (2015): “如何认识和理解东盟——包容性原则与东盟成功的经验”, 《当代亚太》, 第1期, 第4-20页。
34. 周玉渊 (2015): “从东盟自由贸易区到东盟经济共同体: 东盟经济一体化再认识”, 《当代亚太》, 第3期, 第92-112页。
- 竺彩华 (2015): “世界经济体系演进与巨型 FTA 谈判”, 《外交评论》, 第32卷第3期, 第46-71页。

(编辑: 曹滔)